

# 高句丽遗址遗物的新认识

——以韩国最新发掘的遗址为中心

白種伍 著（韩国忠州大学）

金英兰 译（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摘要：**本文以最近在韩国发掘的高句丽城郭为中心，通过对遗迹的结构、遗迹和遗物的共存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为高句丽考古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在韩国发现的高句丽遗址中，只有于红莲峰 1 堡垒与瓠麓古垒遗址出土瓦当。可观察到为了不损害瓦当面而只打掉周缘的打缺现象，这一现象被认为是遗址内部一定范围内举行的特殊礼仪行为。瓠麓古垒遗址的瓦当出土于水井址，表明此现象是有意举行的人类行为。与之相邻的地穴式墙体建筑址也发现有瓦当，因此也被认为是举行特别仪式的设施或空间。出土的遗物有官帽、各种锤形陶制品、黑色磨光短颈壶及碳化谷物、兽骨等。其中一些仿实物制作的异形陶器，可能为与祭祀有关的特殊器物。所发现的已熟碳化谷物可能被用于谷物神崇拜，祭祀于收获谷物的 10 月份进行。此外，牛、马、野猪等六种动物的骨头也随伴出土。值得关注的是，兽骨的每个部位均严重破损，且集中出土特种动物的特种部位骨头，如野猪的头骨。其中牛骨可能与牛蹄占卜有关，野猪骨和鹿骨则与狩猎祭祀有关。

综上所述，红莲峰 1 堡垒与瓠麓古垒是规格较高的重要遗址，并且以这两处遗址为中心举行祭祀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如果举行与高句丽同盟祭祀类似的仪式，就不能排除在其行政中心举行的可能性。即，这两处遗址不仅具有军事功能，而更有可能为举行象征性礼仪行为的空间。

**关键词：**高句丽，城郭，堡垒，礼仪，祭祀，瓦当，平瓦，毁器

## 一、序言

在韩国，改变以往的对高句丽认识的考古学成就早已出现。1946 年，国立博物馆主持发掘的庆州壶杆塚出土 1 件刻有“乙卯年國岡上廣開土地平安好太王壺于十”铭文的青铜壶杆。根据铭文判断壶杆的制作时期为公元 415 年，铭文对高句丽和新罗关系的研究提供重要线索。类似的遗物还有，瑞凤塚出土的延寿在铭银盒<sup>[1]</sup>，金冠塚出土的青铜四耳壶，皇南大塚南墓出土的银盒等。此外，还有忠清北道忠州地区出土的延兴五年铭金铜光背、庆尚北道宜宁地区出土的延嘉七年铭金铜佛像等。自 1979 年发现中原高句丽碑开始，人们对高句丽历史的了解逐渐增多，以此为基点，以汉江流域和临津江为中心发掘了更多高句丽遗址，目前为止共发掘 30 多处遗址。韩国的考古学材料对了解高句丽鼎盛期的社会、文化以及统治方式等方面提供重要资料。

通过调查发掘所积累的韩国地区有关高句丽遗址的情况，显示出与中国、北朝鲜地区的高句丽遗址不同特征。对这些不同特征进行分析和研究，是高句丽考古的重要内容。

本文拟用一种广阔的视角，透视一种行为所表达的意义和象征性。我们将把重点放在韩国高句丽遗址的城郭上，将其作为高句丽社会与文化的复合遗迹来进行研究，而不能局限于探讨其作为边防军事设施的作用。

## 二、韩国境内高句丽遗物的发现

韩国地区共发现 90 多处<sup>[2]</sup>高句丽遗址，其中确认出土瓦类的只有 10 多处。可见比例上占少数，其原因可能为瓦类属于高级建筑材料。瓦具有防水、防火等优点，并且能体现出建筑物本身的威严性和装饰性，象征性地表现等级的高低。因此，瓦作为重要建筑材料可能仅使用于王宫和神庙、佛教寺院、官厅等国家建筑物上<sup>[3]</sup>。

高句丽遗址中出土瓦类的遗址有瓠窰古垒、唐浦城、舞等里 1 和 2 堡垒、阿未城、豆垒峰堡垒、六溪土城、红莲峰 1 堡垒等，除红莲峰 1 堡垒属于汉江流域遗址外其余均属于临津江流域的遗址。其中只有瓠窰古垒、红莲峰 1 堡垒和唐浦城进行发掘。全部遗址均发现平瓦，但出土情况不同。瓦当只发现于红莲峰 1 堡垒和瓠窰古垒两座遗址。

在韩国，莲花纹瓦当首次发现于红莲峰 1 堡垒。出土瓦当的地点有 1 号建筑址（N4W，2），12 号和 15 号建筑址（S1E1），1 号竖穴遗迹和 18 号建筑址（S4E3）等<sup>[4]</sup>。其中 1 号和 12 号建筑址属于地穴或半地穴式结构，推测为顶部盖瓦的瓦房<sup>[5]</sup>（图一）。出土的遗物除瓦当之外还有釜形陶器和柱座类等（图二），这两种器形仅发现于峨嵋山堡垒群。釜形陶器是集安和平壤地区常发现的陶器，值得关注<sup>[6]</sup>这一点。

共发现 7 件瓦当，均用一枚瓦范饰 8 瓣组合式莲花纹。瓦面由 2 枚粘土板粘合而成，之后再接周缘部分，周缘部高于瓦面。直径约 17~19 厘米、厚 2 厘米，属于大型瓦当<sup>[7]</sup>。其中一件瓦当周缘部完全缺失，其它六件只残存瓦面的一部分。红莲峰 2 堡垒还出土公元 520 年制作的‘庚子’铭陶器，因此推测其制作时期为平壤城期，即 6 世纪前半期。由于能提供绝对年代的材料数量非常有限，上述资料对平壤城期瓦当的编年给予重大意义。

其中 S4E3 出土的瓦当最引人关注。瓦当的周缘部分留有明显的人为加工痕迹，此现象从瓦当正面与背面均能观察。推测为有意加工留下的痕迹，要不然不可能如此精巧。瓠窰古垒出土的遗物中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瓠窰古垒水井址的 160 厘米深处发现一件瓦当。水井址位于东墙内中央，周围有竖穴遗迹和地穴式墙体建筑址。大小为东西长 105 厘米、南北长 120 厘米、深 263 厘米，平面略呈方形。底部由加工成四方形的圆木上再盖 13 层左右的玄武岩石材筑成。内部出土黑色磨光短颈壶等陶器类及大量兽骨（图三）。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中央有突出的半球形子房，周围有六瓣形莲花纹，表现出立体感。瓦当残存直径为 11 厘米、厚度为 3.5 厘米<sup>[8]</sup>。周缘部完全缺失的现象类似于红莲峰 1 堡垒出土瓦当的情况，即人为打击瓦当的周缘部，并且正反面均留有其制作痕迹。

根据上述描述可知红莲峰 1 堡垒出土的属于大型瓦当，瓠窰古垒出土的属于中型瓦当。对瓠窰古垒出土的单板莲花纹瓦，提出是否适用于一般性木制建筑物的问题。原因有二，其一为瓦当的厚度远超过宽度，其二为目前为止于其他遗址从未发现这种特殊纹饰。

进而，近一万件瓦类中，仅此一件瓦当于水井址发现的现象是难以理解的。推测其为有限度地使用于具有某种特殊用途的建筑上，而不与一般平瓦一起使用于普通木制建筑。因此，与水井或地穴式墙体建筑址、竖穴遗迹中发现的瓦当进行比较研究，对于了解瓦当性质方面有更大帮助。

与水井址同时期建造的还有地穴式墙体建筑址。首先挖掘长宽各 6 米、深 2.5 米的方形土壤层后，内部整齐地筑玄武岩石材而成。墙体内部贴黄褐色粘土，底部玄武岩上垫柞树、榉树、桤木等粗木。粗木上面铺 1 米左右的芦苇等草本植物，其上再盖 20 厘米左右的粘土。

内部发现陶片及 200 多件兽骨（图四）。据下颌骨分类分析结果，确认有牛、马、野猪、鹿、獐及狗等至少有六种动物。作为家畜的牛和马的出现比例较高，野生动物中野猪的出土比例比鹿高且它们的受损程度也高，值得注意<sup>[9]</sup>这两点。瓦堆积中发现有碳化的米、粟、豆、

红豆等谷物类，分析结果表明均为已熟的谷物<sup>[10]</sup>。

竖穴遗迹（N4W2）连接于水井址，其规模为东西长 440 厘米、南北宽 390 厘米、深 88 厘米，平面形态呈不规则椭圆形。竖穴底部的北边留有玄武岩石块和卵石 5 件，其周围发现有烧土和木炭，土壤被烧成坚硬状态。内部发现有高句丽陶片和冠状陶制品、陶枕形陶制品、用途不详的灰色陶器、三足陶砚、陶锤及石锤等多种形态的遗物。竖穴遗迹填土的内部和南部（N4W3）地点发现红褐色砖片<sup>[11]</sup>。推测这些遗物为使用于礼仪行为的特殊器皿而不是简单的生活用器，最典型的是二重官帽形陶制品，其形态类似于高句丽壁画墓上的折风。表面经打磨，显得较光滑，呈黑色，中间部分较圆，留有连接线时所利用的孔<sup>[12]</sup>。大小为 7 厘米，不是实用器，是仿真品制作的模型。红莲峰 1 堡垒和瓠窰古垒出土的莲花纹瓦当周缘均有毁掉痕迹，其行为的发生地点推测为堡垒内部的特定空间。红莲峰 1 堡垒不一定有跟遗物有关的遗迹，但瓠窰古垒是遗物出土于水井址，能看出是有意进行的人类行为。因此，如果对水井的功能再次进行分析，就可知它不仅具有储水功能，还有其它功能。因为在这种地层挖井就很难发挥水井的作用，所以推测该地方为举行特殊仪式的设施或空间。可能连接的地下式墙体建筑和竖穴遗迹也为达到同样目的而建，并且也是举行某种特殊仪式的设施或特定地点。

### 三、高句丽遗址的新认识：祭祀遗址

#### 1) 祭祀的背景

《三国志：高句丽传》记载有关高句丽祭祀情况的内容。如下：

“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簿头著幘，如幘而无余，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其国东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国中大会，迎隧神还于国东上祭之，置木隧于神座。无牢狱，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sup>[13]</sup>

上述材料主要记述国中大会的名称、统治阶级的服装、国中大会的程序与形式、祭家会议过程等四部分<sup>[14]</sup>。祭天大会作为公会，是国家的正式礼仪大会，参加时必须穿戴丝绸和金银装饰的华丽服装。服装又因大加和小加的官职而有区别，说明高句丽统治阶层内部有严格的等级观念。国王在主管祭祀的同时，还要显示垂直的支配结构<sup>[15]</sup>。

10 月份举行的国中大会盟不仅是为祖先举行的礼仪活动，而且是讨论国家重大事件和判定罪人的决议机构。一方面认为，这种礼仪是对桂娄部系统建国神话的具体化，将祭家会议的决定包装成天神的决定，借以强化现实生活中的约束力。另一方面认为是，通过祭家会议的赋税和纳贡所掌握的高句丽经济权的政治礼仪<sup>[16]</sup>。高句丽的国中大会盟是国家主导的祭祀活动，这不仅提高王室的政治地位，还可以强化国家团结力。但对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是否为当时的首都—国内城的问题上仍存在不同意见。小兽林王以后，高句丽开始采取强化中央集权、颁布律令等措施改变古代国家体制。随着古代国家体制的确立，王室为中心的佛教文化开始向贵族社会扩散，逐渐确立成为高句丽社会的主要观念。佛教虽然也波及到平民社会，但在广开土王陵碑上却找不到与此相关的内容。却想从河伯的外孙那里找到高句丽王室的正统性。高句丽社会虽然流行佛教，但广开土王陵碑建立之时的长寿王时期仍然特别重视始祖传承，而且认为王的恩惠影响四海，要想把始祖传承正统性扩散到全国。高句丽的始祖传承与佛教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矛盾是不清楚的。但从王室主导下建立寺庙的形式来看，可以看出高句丽比新罗和百济更积极鼓励佛教的事实。佛教经历一百多年的盛行，但以朱蒙为中心的始祖传承信仰仍广泛传播。

这种始祖传承信仰也确实扩散到广开土王开辟的新领土。高句丽的始祖传承信仰是，摆脱高句丽王室桂娄部的固有信仰，发展到开办国中大会、公式化其神圣性的阶段。高句丽领

土快速扩张的广开土王到文咨王时期，为了对扩张的领土确立高句丽王室的正统性，就传播了佛教及作为高句丽王室固有信仰的始祖传承信仰。而且也不能排除作为国家祭祀的同盟祭祀扩散至国内城或平壤城之外地区的可能性，因为要把新编入的附属地置于高句丽的支配下，传播追求普遍价值的佛教不如强调立于特殊性的同名神话有利。而且占领临津江-汉江流域的原百济领土的高句丽，为了强调百济和高句丽的统治阶层出于共同根源，有必要稳定新编入的附属民。所以类似于高句丽会盟祭祀的礼仪于新附属地举行的可能性较高。

## 2) 祭祀的场所及形式

到目前为止，未找到类似于会盟祭祀的有关始祖传承的祭祀在汉江-临津江流域以何种方式进行的直接史料，因此只能根据已确认的考古学材料推测大体情况。以下为有关祭祀举行场所的材料。

“迎隧神还于国东上祭之，置木隧于神座。”<sup>[17]</sup>

上述材料是《三国志·东夷传》所记载的会盟祭祀过程的一部分。此外，《翰苑》记载其祭祀地点为“国东水土”，在江边举行祭祀的原因可能为河伯是水神<sup>[18]</sup>。水神祭属于会盟礼仪的一部分，性质不同于祭天为主的祭天礼仪，可以理解成祭水神<sup>[19]</sup>或谷物神<sup>[20]</sup>等的活动。总之，确认构成会盟祭祀一部分的水神祭举行于江边，因此，如果在韩国的高句丽遗址中有祭祀活动，其发生地点也应该在江边。韩国有较多位于江边的遗址，所以不能断定是哪一个遗址。但可以根据下面史料来推测其祭祀地点。

“其所据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瓦”<sup>[21]</sup>

根据上述史料，可知高句丽时期瓦使用于佛教寺院、神庙、王宫、官厅等建筑。而且举行国中大会盟祭祀的场所中也出土瓦，如有红莲峰 1 堡垒、瓠觥古垒、唐浦城、舞登里 1 堡垒、德津山城、六溪土城等遗址。其中红莲峰 1 堡垒和瓠觥古垒遗址出土的瓦当推测为高句丽平壤城时期的莲花纹瓦当。瓦当的出土说明这两座遗址的地位高于其它高句丽遗址，可能为当时高句丽郡的枢纽机构。两座遗址不仅位于中心地区，而且是级别高的遗址，因此祭祀以他们为中心举行的可能性较大。高句丽的国中大会是以国内城为中心举行的，与此相同，如果举行与会盟祭祀类似的活动，当然不能排除在其行政中心举行的可能性，而且两处遗址位于江边的特征提高了其为祭祀举行地的可能性。

不难找到高句丽遗址中发现的瓦当与祭祀有关的事例。国内城的墓葬中出土的瓦当可能使用于塚上建筑，证明追悼先王的建筑上使用瓦当的事实。塚上建筑上使用莲花纹瓦当，可知莲花纹不仅用于佛教礼仪，还应用于国家礼仪。墓葬周围发现的瓦当中观察到损毁周缘的现象，从此可知瓦当作为建筑物的装饰功能之外还利用于祭祀或其它活动。周缘损毁的瓦当还发现于集安地区的西大墓、太王陵、将军坟，平壤等地区，这些应该与红莲峰 1 堡垒和瓠觥古垒出土的瓦当周缘损毁现象有关（图五）。不管是临津江流域的瓠觥古垒还是汉江流域的红莲峰 1 堡垒，作为中心区域，举行类似同盟祭祀的始祖传承仪祭的可能性较高。

但有两点疑问，一为祭祀的性质及形式如何，二为是否存在举行类似会盟祭祀活动的地方。因为没有直接的史料来证明，所以就无法确认其具体事实。但随着临津江和汉江流域高句丽遗址的发掘日益发达，能够确认的考古资料也日益增加，给部分复原祭祀活动提供有力线索。

瓠觥古垒地穴式墙体建筑址的瓦积之间出土已碳化的米、粟、豆、红豆等少量谷物类。如果地穴式墙体建筑物上盖有瓦，推测这不是单纯的仓库，而是官厅或寺刹等具有权威的建筑物。众所周知，高句丽使用叫桴京的瓜庵形仓库，未设置像新罗和百济一样的半地穴式竖穴仓库，而且瓦积层的形成有力证明建筑址上部设有用瓦建筑的屋顶。因此有必要关注这里所

出土的熟谷物<sup>[22]</sup>。碳化谷物量太少，不可能是粮食储备仓库<sup>[23]</sup>，这些谷物可能使用于前面所说的水神祭。水神祭是为谷物神所拜的祭祀，于象征谷物的成熟期的10月份举行。

地穴式墙体建筑址中除含有谷物外还发现有兽骨。保存肉类的时候，应采取干燥或烟熏的方法来解决肉的新鲜度问题，在此过程中，为了方便加工尽可能切成小肉片或肉丁，并且会扔掉大部分骨头。因此兽骨的出土表明仓库的用途不是储存肉类而是有其它目的。

地穴式墙体建筑址出土的兽骨中牛骨占39.2%、马骨占33.3%、野猪骨占21.7%、狗骨占3.3%、鹿骨占1.7%、獐骨占0.8%，其个数为牛和马各3只、野猪4只、狗1只、鹿和獐各1只<sup>[24]</sup>（图六）。值得注意的是，瓠窰古垒发现的兽骨每个部位都严重破损，并且为特定动物的特定部位，如野猪的头骨。如果是储藏食品的仓库，就不会大量保存使用度较低的头部，说明地穴式墙体建筑可能与祭祀或礼仪有关而不是保存肉类的仓库。

上述动物与高句丽始祖传承中出现的动物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证明这些动物利用于祭祀或礼仪活动。《魏书·高句丽传》详细记载有关高句丽始祖传承的内容，如下：

“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与豕，豕又不食；弃之於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sup>[25]</sup>

朱蒙的出生就与一般人不同，它被金蛙之命抛弃后受到鸟和动物的保护。当时夫余的官名叫做马加、牛加、猪加、狗加，这与保护朱蒙的马、牛、猪、狗等动物是一致的，说明夫余贵族都没有迫害朱蒙的意思<sup>[26]</sup>。高句丽人虽然把这些动物当作食物，但也不能排除把它们当成神圣动物的可能性。高句丽初期的记载中出现的猪是利用于祭祀的神圣动物，而且发生与之有关的祥瑞之事。如用于山上王12年祭祀的猪跑掉，掌者追至酒桶村，在一美丽女子的帮助下抓到猪。王“闻而异之，微行夜至女家”<sup>[27]</sup>。

对于始祖传承中未出现的獐，《三国史记·祭祀志》记载每年三月三日，高句丽人集中于乐浪丘陵上杀猪和獐祭天山<sup>[28]</sup>的内容。《列传·温达传》记载除与《古记》一样的内容外，还补充王打猎的时候多名臣下和五部士兵随从的内容。这样猪和獐是高句丽人祭祀仪式上不可缺少的重要打猎对象，因此瓠窰古垒出土的兽骨有可能为使用于祭天仪式的骨头。集安太王陵陪葬墓出土牛、马、猪、狼、貉、鹿、马鹿等动物骨头，可以与瓠窰古垒出土的兽骨做一番比较<sup>[29]</sup>。

高句丽遗址里举行的祭天行事的目的是和功能究竟如何？与之相关，《翰苑》引用《魏略》记载“战争之时也祭天，根据牛蹄判断吉凶”<sup>[30]</sup>。这为《三国志·东夷传》中所略的，推测高句丽会盟祭祀之时所增加的。此内容为基础的会盟祭祀，可能具备为打仗所准备的功能。即认为会盟是进入冬季前的大规模狩猎和过冬季的大规模祭祀<sup>[31]</sup>，而且通过狩猎祭保障战斗力的扩大且提高对外战争能力<sup>[32]</sup>。高句丽初期，出现秋天狩猎、冬天打仗的现象<sup>[33]</sup>，打仗之前，高句丽人为战争的胜利祭天祈祷，难以预测胜负就杀牛用牛蹄占卜，瓠窰古垒出土的牛骨是证明牛蹄占的材料。瓠窰古垒出土的马骨是从头盖骨到肢骨蹄保存相当完整，但牛骨却缺失蹄部。是否与前面记录有关呢？而且占卜战争吉凶的行为符合作为军事据点的江边平地城的性质，所以高句丽遗址内举行的祭祀不仅是与始祖传承有关的祭祀，还有与战争有关的牛蹄占法也相当普遍。

由上述可知，猪和马鹿的骨头与狩猎祭有关，牛骨、牛蹄与占卜有关。相反，马作为战争物资被食用的可能性较小。由以下记载为基础，了解瓠窰古垒出土马骨的意义。

“申之以盟誓，刑牲歃血，共敦终始…。至是，刑白马而盟，先祀神祇及川谷之神，而后歃血。”<sup>[34]</sup>

以上为与新罗、百济间的会盟仪式有关的内容。当时杀白马喝血作为会盟的证据，这里

所说的白马作为祥瑞动物在军事会盟中必要之物。根据新罗百济间的会盟中使用白马的事实，推测高句丽的会盟仪式中也可能使用白马。会盟虽然是国家间的重要协定仪式，但作为重新确认军事指挥权的仪式，普遍实行的可能性较高。南部地区发现较多有孔壶等遗物，说明作为国家间大型仪式的会盟仪式普遍实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资料来证明高句丽的会盟仪式中是否真的使用白马或有什么辅助使用的陶器等方面内容。发现的马骨数量相当多，由此推测马可能利用于祭祀活动，而不是作为单纯的食物被人食用。

红莲峰 1 堡垒也有可能为祭祀遗址。红莲峰 1 堡垒的瓦建筑物属于地穴式或半地穴式，其形式类似于瓠麓古垒遗址的建筑物。两座遗址的周围都发现有木栅柱址，说明遗址不仅有军事功能，还具有履行象征性礼仪的特殊功能。

## 四、结语

在韩国发现的高句丽遗址中，只有在红莲峰 1 堡垒与瓠麓古垒遗址中出土瓦当。瓦当表面上能观察到为了不损害瓦当面而只打掉周缘部份的打缺现象，这一现象被认为是遗址内部一定范围内所进行的特定礼仪行为。瓠麓古垒遗址的瓦当出土于水井址，这种现象为有意举行的人类行为活动。邻接的地下式墙体建筑址中也发现有瓦当，因此也被认为是举行特别仪式的设施或场所。出土遗物有官帽、陶枕、各种锤形陶制品、黑色磨研短颈壶、釜形陶器类及碳化谷物、兽骨等。其中一些仿实物制作的异形陶器，可能为与祭祀有关的特殊器物。发现的碳化谷物可能被利用于谷物神崇拜，而不是单纯的食用食物，根据谷物的成熟情况推测祭祀可能于收获谷物季节 10 月份进行的。此外，牛、马、野猪等六种动物的骨头混合出土。值得注意的是，兽骨的每个部位均严重破损，且集中出土有些动物的头骨，如野猪。其中牛骨可能与牛蹄占卜有关，野猪骨和鹿骨则与狩猎祭祀有关。

红莲峰 1 堡垒与瓠麓古垒是出土瓦当的两处重要遗址。因此，以这两处遗址为中心举行祭祀的可能性较高。如果在两地举行类似高句丽会盟祭祀的仪式，就不能排除在其行政中心举行的可能性。即，上述两处遗址不仅具有军事功能，还有可能具有举行象征性礼仪行为的功能。

### 注释：

[1] 瑞凤塚出土的延寿在铭银盒上刻有“延壽元年太歲在辛三月中太王敬造合杆/延壽元年太歲在卯三月中太王敬造合杆用三斤六兩”铭文。

[2] 国立文化财研究所：《韩国的高句丽遗址》参考 14~15 页表，2007 年 a。

[3] 《旧唐书》卷 199 上，东夷传，高丽。

[4] 报告书按 GRID 编撰，难以联系出土地点与遗迹。

[5] 高丽大学考古环境研究所：《红莲峰第 1 堡垒》，2007 年 a，184~185 页。

[6] 崔鍾泽：《高句丽土器研究》，《首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53~54 页 1999.，24 页，1997 年。

[7] 根据直径，瓦当可分为小型（12cm 以下）、中型（13~15cm）、大型（16cm 以上）。（白種伍：《高句丽瓦的成立与王权》，98 页，2006 年）。

[8] 韩国土地公司土地博物馆：《涟川瓠麓古垒 III》224 页，2007 年。

[9] 根据瓠麓古垒出土的动物资料分析结果来看，大体是牛占 39.2%、马占 33.3%、野猪占 21.7%、狗占 3.3%、鹿占 1.7%、獐占 0.8%，个体数为，牛与马各 3 只、野猪 4 只、狗、鹿、獐各 1 只。兽骨的破损程度及其形态是，与屠杀动物或利用动物的方式、堆积及堆积以后的过程有关，但瓠麓古垒发现的兽骨是在所有部位的破损程度均较高，推测与堆积过程有关。从头盖骨到肢骨发现频率差不多的牛与马的骨头，可能与一般的储藏情况不一样。军事、运送为目的而使用的马和牛是到一定年龄不能再执行其功能的时候才被屠杀当

食物，因此推测被屠杀年龄较大。根据牙齿磨损度与骨端部位的缝合程度来观察，牛的年龄是3~4岁、马是4~5岁。实际屠杀年龄应该是其以上。并且鹿、獐、野猪是表现特殊行为的动物资料的堆积、保存及发现。野猪头骨的集中出土，说明可能与祭祀或礼仪行为有关。但报告者认为在祭祀或礼仪方面的研究不完善的情况下，根据它的所表现的与一般情况不一样的现象，认为它是礼仪行为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李俊正：《动物资料分析》，《涟川瓠蘆古垒Ⅲ》330页，342~344页，2007年）。

[10] 朴泰植：《炭化谷物分析》，《涟川瓠蘆古垒Ⅲ》321~323页，2007年；《涟川瓠蘆古垒Ⅲ》224页，2007年。

[11] 韩国土地公司土地博物馆：《涟川瓠蘆古垒Ⅲ》224~225页，2007年。

[12] 韩国土地公司土地博物馆：《涟川瓠蘆古垒Ⅲ》285页，2007年。

[13] 《三国志》卷30，魏书30，东夷传，高句丽。

[14] 最后举行的祭家会可能与同盟祭仪无关，但扶余在灵故实行刑法、处决罪犯的内容来看，祭家会议可能是作为国中大会的一部分来举行。（尹成龙：《高句丽建国神话和祭仪》，《韩国古代史研究》39卷，23~27页，2005年。）

[15] 崔光植：《高句丽的神话与国家祭祀》，《高句丽的文化与思想》35页，2007年。

[16] 同注[14]及李正斌：《高句丽东盟的政治礼仪性格与功能》，《韩国古代研究史研究》41，185~195页，2006年。

[17] 《三国志》卷30，魏书30，东夷传，高句丽。

[18] 尹成龙：《高句丽建筑神话与祭祀》，《韩国古代史研究》39，23~24页，2005年。

[19] 卢泰敦：《部体制的成立及其结构》，《高句丽史研究》159~160页，1999年。

[20] 权五荣：《韩国古代史的鸟观念与祭仪》，《历史与现实》32，100~101页，1999年。

[21] 《旧唐书》卷199上，东夷传，高丽。

[22] 朴泰植：《炭化谷物分析》，《涟川瓠蘆古垒Ⅲ》321~323页，2007年。

[23] 韩国土地公司土地博物馆：《涟川瓠蘆古垒Ⅲ》，2007年，104~110页，300~301页。

[24] 李俊真：《动物资料分析》，《涟川瓠蘆古垒Ⅲ》330页，2007年。

[25] 《魏书》卷100，高句丽传。

[26] 崔光植：《高句丽的神话与国家祭祀》，《高句丽的文化与思想》33~34页，2007年。

[27] 《三国史记》卷16，高句丽本纪4，山上王12年条。

[28] 《三国史记卷》32，杂志1，祭祀。

[29] 陪葬墓位于离太王陵南部8米远的地点，2003年发掘当时共出土34件兽骨。分析结果包括有爬虫类、鸟类、哺乳类等，哺乳类有牛、马、猪、北方狼、獐、梅花鹿、东北獐等七种，其破坏程度严重。（陈全家：《集安太王陵1号陪葬墓出土动物骨骼遗存研究》，《集安高句丽王陵》382~384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30] 《翰苑》卷30，四夷部4，东夷4，高句丽条。

[31] 崔光植：《古代韩国的国家与祭祀》，韩吉社，1994年。

[32] 朴承范：《高句丽的国家祭祀》，《史学志》34卷，97~99页，2001年。

[33] 金瑛河：《韩国古代社会的军事与政治》152页，2002年。

[34] 《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6，文武王5年条。

## A New Understanding of Relics of the Koguryo Kingdom in South Korea

Baek JongOh

**Abstract:** historic sites of the Koguryo Kingdom found in South Korea, the male-Makse were found in only two places, Fort 1 of Hongryeon-Peak and Horogoru Fort. (Makse refers to the tiles decorated on the edges of eaves and they are classified as male and female.) The two male-Makses showed the same pattern in which the rim was separated from the surface in order not to harm the surface. This was the conventional way of separating the rim only and it was performed in a certain space of a fort. As for the Horogoru Fort, the male-Makses were found in a place that was suspected to be a well,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re was intentional burying there. The nearby building site with underground-style walls was supposed to be a place that had the same purpose and it is suspected that special performances were conducted the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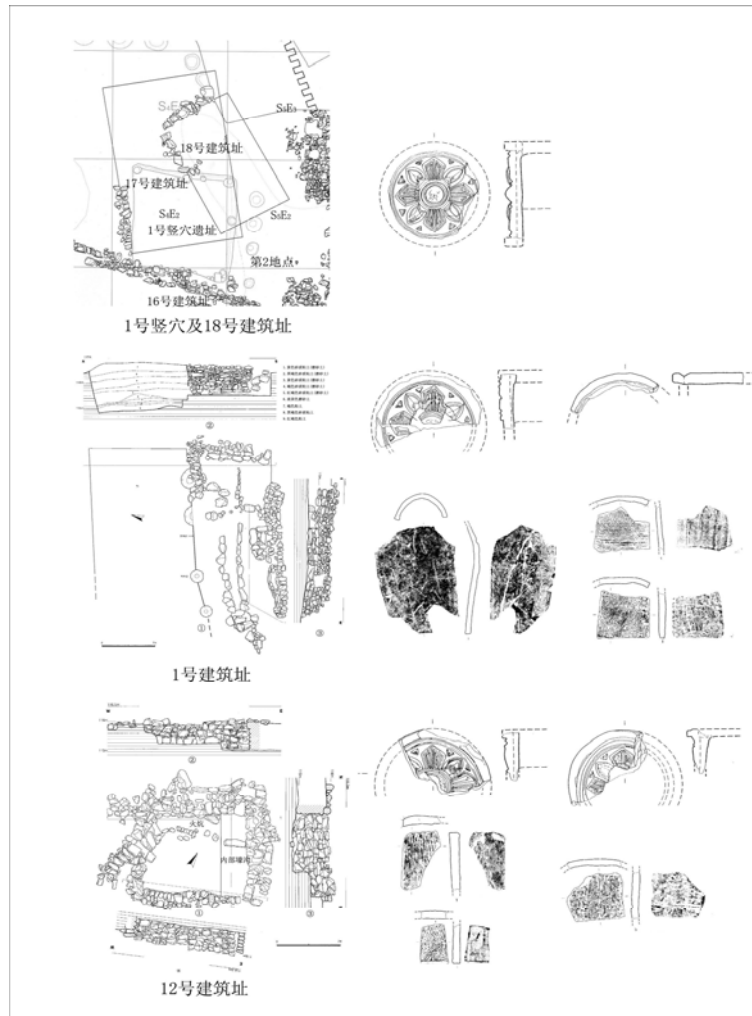
Diverse kinds of earthen wares such as official hats, hair bands for the hats, weights for a balance, short-neck black polished jars, pot-style earthen wares, crops, and animal bones were found to prove this assumption. Among them, many different forms of earthen wares were the models that had the same form of actual ones. It was suspected that the earthen wares were special wares related to ritual services. Well-matured crops strongly represented the properties of ritual services that were served to the Crop God, and there was the possibility that services were conducted around October after the harvesting of crops.

Alongside there were six kinds of animal bones found together such as ox/cow, horse, and wild boar. The bones were very severely damaged in every part and especially as for the wild boar, only the bones of their heads were found in most cases. Cow and ox bones may be related to fortune-telling with a cow or an ox's hoof and the bones of deer and boar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itual services for hun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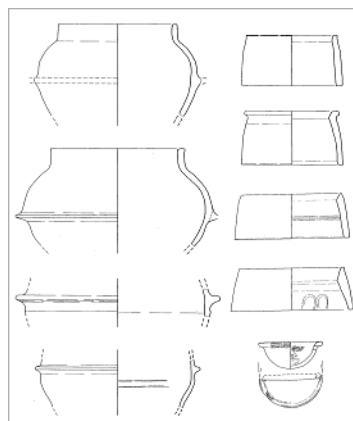
Thus, Fort 1 of Hongryeon-Peak and Horogoru Fort are very important historic places in which male-Makses were found. There is a high possibility that the ritual services were performed centering on these sites. If the ritual services that were similar to the Dongmyung Ritual Service of the Goguryo Kingdom had been performed there, they would have been done in a place of administration. That is, the two sites hold significance in representing the space of symbolic ritual services as well as having military functions.

**Keywords:** Koguryo Kingdom, fortress, fort, conventional behavior, ritual service, male-Makse, roof tile, damag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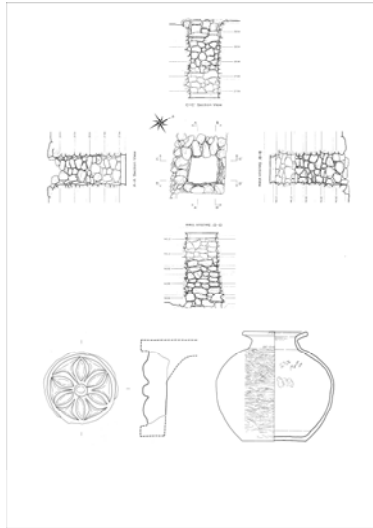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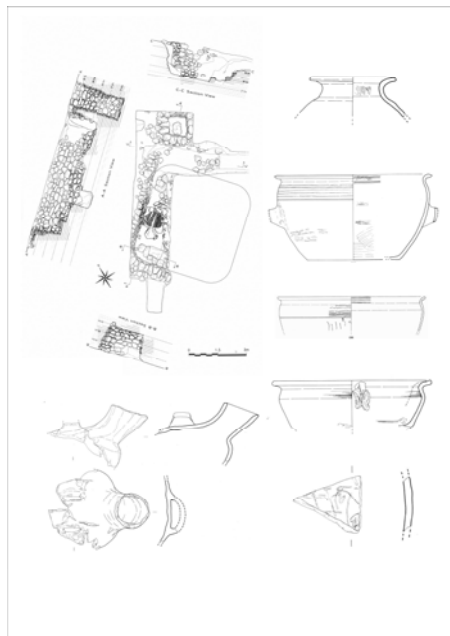
〈图一〉红莲峰 1 堡垒建筑址和出土遗物  
 (高丽大学考古环境研究所, 2007a, 再编)



〈图二〉红莲峰 1 堡垒出土的釜形陶器和柱座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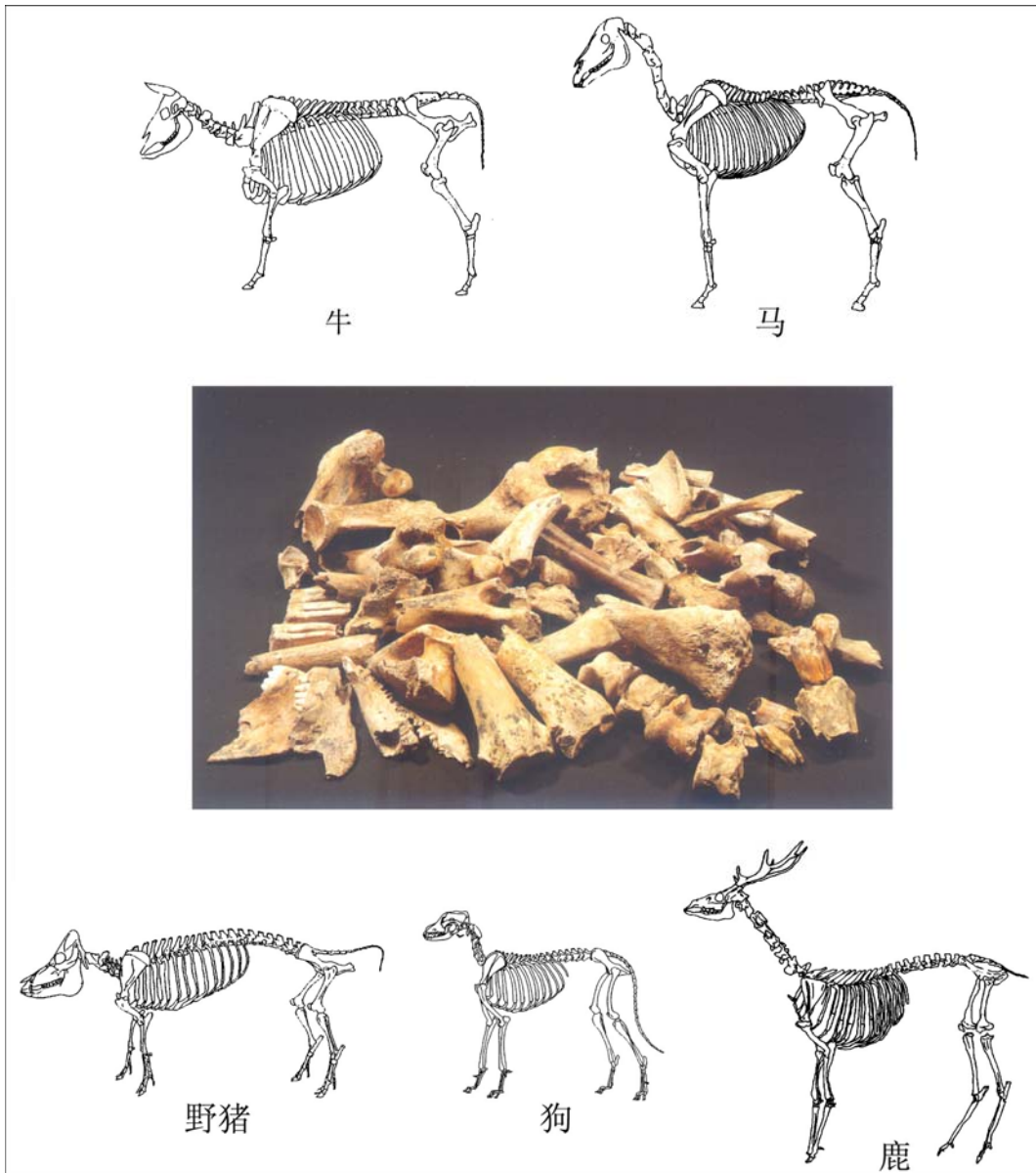
〈图三〉 瓠窠古垒水井遗址及出土的遗物  
 (韩国土地公司土地博物馆, 2007, 再编辑)



〈图四〉 瓠窠古垒地下式墙体建筑址出土遗物 (韩国土地公司土地博物馆, 2007, 再编辑)



〈图五〉红莲峰 1 堡垒和瓠麓古垒出土的莲花纹瓦当



〈图六〉瓠窰古垒地下式墙体建筑址出土的兽骨